

#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中产阶级夫妻的地位关系

李宝芳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天津 300191)

【内容摘要】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夫妻的地位关系经历了早中期以父权制为主导到末期的渐趋平等。这种地位关系的变化反映出维多利亚法律、习俗、文化及两性社会地位的变迁,也折射出这一阶级独特的家庭观念和性别角色分工观念。

【关键词】维多利亚时期 中产阶级 夫妻地位

中图分类号 K5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1)10-0087-03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中产阶级夫妻的地位关系,大致可以概括为维多利亚早中期以父权制为主导的地位关系和维多利亚末期渐趋平等的地位关系。地位关系的变化脉络反映出维多利亚法律、习俗、文化及两性社会地位的变迁,也折射出这一阶级独特的家庭观念和性别角色分工观念。

## 一、维多利亚早中期以父权制为主导的地位关系

维多利亚时期跨越了60多年的时间。根据社会发展情况,一般将其分为早期(1837—1851)、中期(1851—1875)和晚期(1875—1901)三个阶段。维多利亚早中期,中产阶级家庭是以父权制为主导的。

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是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反映。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仍然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其主导信仰是,妇女低劣于男人,妇女地位低于男人。与男尊女卑的社会地位相对应的,此时的大多数家庭都是父权制的,中产阶级家庭也是如此,夫妇地位的主导关系是夫尊妻卑,妻子附属于丈夫,丈夫的地位高于妻子。权威等级被广为接受、不受争议:上帝把权威授予男人,男人统治女人,女人通过从男人那里授权管理家庭——孩子和仆人。在家庭内部,生活是在一种等级和礼仪的体系下运转的,丈夫和父亲是这个体系的主人。实际上中产阶级的妇女更通常被她的配偶视作一种高级仆人。她的工作就是使家庭能得以顺利和谐地发挥作用。萨拉·斯蒂克尼·埃利斯是当时一个很受妇女欢迎的作家,她说:“很可能你比你的丈夫有更多的才能,有更高的成就,你也可能很受尊敬,但这与你作为一个妇女的处境毫不相干,作为一个妇女必须低于男人。”<sup>[1]</sup>这一时期,中产阶级家中,父亲(丈夫)是中心人物,拥有绝对的权威。比阿特里斯·韦伯在日记中就描写了她的父亲理查德·波特在家中的中心地位:“尽管我的父亲经常不在家,但他是家庭生活的中心人物——是家庭的光和热。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我们女孩子们听到马车的车轮声音就跑到前面的门口

……”<sup>[2]</sup>从中可以看出,在家外工作的男人在家里享有多高的地位和尊重。这一时期,家庭与工作场所分离,男人在家外工作的时间延长,因此根据男人工作时间来定的家中就餐时间也发生了变化,晚餐时间变得更晚,以便等候男人下班归来。而且在父亲就餐时,所有孩子都必须保持安静。孩子们也观察到她们的母亲是如何遵从她们丈夫的需要。伊尼德·斯塔基回忆道:在我母亲看来,他(父亲)做的每件事都是对的,他说的每句话都是圣旨,她永远不允许有人怀疑他的话。她认为一个妻子的生活,一个家庭中所有女性的生活都应该围绕男家长转<sup>[3]</sup>。在女儿眼中,母亲完全是为了父亲的需要而活着。

中产阶级家庭中父权制之所以存在,首要的原因是英国历史上的父权制传统。父权制关于女性地位卑下的观念突出表现在两方面:1.在身份与地位上,强调女性的非自主性,宣扬她们是男性家长的附属者。男性是一家之长,女性依据与男性的关系定位自身为女儿、姐妹、妻子和母亲,唯独不是她们自己。2.在职责分工上,“男主外、女主内”是父权制的传统性别角色分工,此种性别分工被认为是天然的安排。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将两性职责分离的观念推广开来,强调男性的“公共领域”与女性“私人领域”的互补性,提出“男性为唯一养家糊口者”的家庭观念,强调女性的持家职责和贤妻良母的形象。父权制存在的原因之二,英国法律的规定也赋予男性较高的地位和极大的权利。英国习惯法规定,妇女一旦进入婚姻状况,就意味着法律上的“死亡”,她几乎丧失所有人权,就像当今的重罪犯进入监狱时一样。她没有全权支配她的劳动所得,不允许选择自己的住所,不能合法地处置自己的财产、签署文件或充当证人。也就是说,妇女在结婚以后,就与罪犯、白痴和未成年人一样丧失了公民权,其法律地位是虚无的。英国普通法剥夺了已婚妇女的法律独立性,妇女完全被置于丈夫的控制之下,只有在

\* 作者简介:李宝芳(1980-)女,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

1870、1882、1893年的已婚妇女财产法中才得到部分的修改。法律把夫妻视为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丈夫,任何属于妻子所有的东西都同时属于丈夫,即使儿女也是属于丈夫的,“法律上他们是他一个人的子女,他是唯一有资格对子女行使权利的人”。他可以毫无理由地带走孩子或者把他们送到别处去抚养。直到1839年婴儿监护法给予没有犯通奸罪的母亲对7岁以下儿童的监护权。1873年,法律扩展到允许母亲即使犯有通奸罪也有权监护16岁以下的儿童。1857年离婚法案中关于男女要求离婚理由的不同规定就表明了当时流行的性道德双重标准。一个男人,如果妻子犯有通奸罪,他就可以得到离婚。对于一个女人,只有在丈夫犯有通奸罪并且伴有身体虐待或者其他极端的情况下才能起诉离婚。尽管现实生活中中产阶级夫妻并不一定总是按照法律行事,但是法律加诸女性的一些严重限制,还是提供了丈夫在家中拥有权威地位的一个相当大的诱因。

维多利亚体面的道德观也要求男人地位高于女人,丈夫地位高于妻子。体面是维多利亚文化的关键词。保持体面更是中产阶级维护自己身份和地位的需要。对中产阶级来说,男人享有权威、妻子儿女顺从听命是体面的重要内容。中产阶级妇女一般要坚守严格体面的行为准则,被期待要脆弱、纯洁、无知、对丈夫言听计从,生活只限于家庭。最后但也是根本的原因是,对于当时大多数中产阶级妇女来说,她们的命运完全维系于婚姻,婚姻是她们唯一的出路。在已婚妇女财产法案颁布之前,妇女的一切收入和财产都属于丈夫。家庭支配权是经济支配权的一种体现,不能掌握经济上的支配权,就不能拥有家庭的支配权。妻子屈从的根据就是她要受丈夫的保护和供养。婚后妻子在经济上依附于丈夫导致不平等的婚姻关系,妻子地位低于丈夫,除了遵从男人之外别无选择。维多利亚时期的进步女性也意识到,要想使女性在婚姻中获得与男性的平等,首先必须保证的是她们经济上的独立。

## 二、维多利亚末期渐趋平等的地位关系

维多利亚末期,家庭父权制观念开始遭到公开的抵制,男人的权威地位也被削弱,夫妇的地位关系更趋向平等。父亲的法律权利第一次遭到议会法律和司法宣判的限制与剥夺。法律在妇女财产权和孩子监护权方面进行了改革。在1870—1923年间的半个世纪里,法律给予了妇女在婚姻中的平等权利。1870年、1882年通过《已婚妇女财产法》给予已婚妇女独立的财产权和与丈夫同等的权利。在1839年《幼儿监护法》的基础上,1873年,法律扩展到允许母亲即使犯有通奸罪也有权监护16岁以下的儿童。1886年法案中又把条件扩充了,分居的妇女被赋予对孩子同样的权利。公众对男人行为的标准越来越严格。婚姻紧张的责任往往归咎于他们。父亲的角色和能力遭到广泛的贬低,很多孩子都不愿意接受父亲的权威。殴打妻子和家庭暴力行为已经变得不容忍,19世纪中期掀起了反对这些父权制行为的浪潮。国家逐步完善了制止家庭暴力的立法,保护妇女的权益。议会于1853年通过“愤怒袭击法案”,试图以立法手段制止家庭暴力行为。在此基础上,19世纪60年代的法律规定,地方治安法官有权对殴打妻子造成其严重身体伤害者

判处6个月的苦役监禁。1878年的婚姻法授权地方法官允许被殴打的妻子不与丈夫生活在一起,同时,法官让丈夫每周给妻子付生活费,允许妻子监护10岁以下的孩子。1895年通过“即决裁判法案”宣布地方法官可以允许以下三种情况的妻子与丈夫分居:丈夫袭击她;丈夫长期残酷地虐待她;丈夫故意不给她和孩子提供合理的生活费。该法案对这些法定的“越规”行为通过负责任的法律条文加以惩罚。无疑,所有这些变化都削弱了男人在婚姻权利上的优势地位。

维多利亚末期父权制遭到削弱和抵制,这种改变不是独立的,而是与维多利亚文化和社会的许多变化相联系的。首先,维多利亚末期妇女的觉醒和信心对父权制提出了一个明显的挑战。维多利亚末期是女权意识的转折点。女性教育获得改革和发展,她们的工作前景也因此而提高。同时,经济的发展也增加了学校、医院和办公室对女性雇员的需求。工作的女孩已经成为所有大城市中办公室和店铺里熟悉的面孔。19世纪末出现了思想先进、独立自主、不受传统观念约束的“新女性”。“新女性”明确地代表着一种对父权制的挑战。她们追求一种独立的生活,这种生活不是出于必需而是一种选择。“新女性”出现在办公室、新闻界等曾经专门给男性的职业中。其次是孩子和童年的地位上升,父亲的权利遭到限制。有一些法规很强烈地影响了父亲的权利,例如1870年义务教育法规定5—13岁的儿童必须入学。1868年济贫法修正案,规定父母不能忽视14岁以下的孩子。1889年防止虐待和保护儿童法案,为在家中遭受忽视或虐待的孩子提供保护。父权的减少也与更放松的家庭生活方式相联系,男人与妻子和孩子更亲近了,很少运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了。再次,是维多利亚时期宗教氛围的剧变。到19世纪80年代时,基督教遭受了重大压力。科学研究中一系列革命性的进展公开地置疑基督教教义的说教。尤其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学说证明创世纪的故事仅仅是一个神话。这种攻击导致中产阶级宗教成员减少。基督教一贯宣扬男人优于女人,女人低劣于男人。基督教遭到置疑,也就动摇了男女地位不平等的宗教基础。另外,维多利亚末期自由平等思想也渗透至婚姻家庭领域,婚姻平等思想被广为传播。而且,这一时期的女权主义者将婚姻中的平等权作为她们斗争的首要目标,认为理想的婚姻是建立在两性相互吸引、相互平等的基础上,双方要成为相爱的伙伴,而不是一方从属于另一方的奴隶。格兰特·艾伦在《行动的女人》一书中,通过女主人公赫敏娜的话表达了婚姻应该是男女平等相爱的结合的观念。她说:“我喜欢你的爱抚,但我必须保持好我的位置,保持好我通过艰辛的努力赢得的一点自由。带着我,做你想做的事情。那就是我像每个女人一样爱他和他爱的人所能屈服的最大限度。但超过界限的,绝对不行。那会背叛了我的生活,我的将来,我的个性,我的自由。”<sup>[4]</sup>这正是女性对现实不满的呐喊,也是对新型平等婚姻关系的期盼。

在父权制遭到削弱的背景下,中产阶级的夫妇地位呈现出渐趋平等的趋势。1881年,伊丽莎白·沃尔斯通霍尔玛与工厂主本·埃尔美已有7年的婚姻,她写道,在每个幸福的家庭里,变化是完全的。没有丈夫再要(下转第91页)

现。也就是说,作为权力之下的底层,甚至社会的大多数,他们的故事无人知晓,他们的生活无人问津,他们的心声无处倾诉,他们的声音也只是被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毫无声响。毋庸置疑,一个社会在记忆什么,谁是记忆的主体,这直接彰显了社会的本质属性,并预示着未来的命运。因此,社会记忆研究需要在实现理论承诺的同时焕发出行动的力量。一方面,通过平民口述历史的方法“让那些即便留有踪迹,但原本一直保持缄默的对象说话”<sup>[10]</sup>。在此基础上,权力与技术才能被拆解,历史的真相才能呈现出来。另一方面,话语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言说,更是权利的体现。通过赋予话语权进而赋予底层以权利,失语的底层才能够将沉默的力量转化为对自身以及社会的积极的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不仅是对人性、对生命的尊重,也是对历史与未来的正视,而这些都内含于社会科学研究所肩负的责任之中。

参考文献:

- [1] 孙德忠.社会记忆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 [2] 景军.社会记忆与中国问题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秋季期),1995:41-51.
- [3] [英]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追求美德[A].哈拉尔德·韦

(上接第88页)求至上的权力,没有妻子放弃自己的良心和意愿。只有真正的一体,深刻的持久的感情占支配地位。<sup>[5]</sup>从中产阶级夫妇地位关系的变化脉络可以看出,中产阶级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以及追求体面等价值观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它也受到维多利亚社会发展、宗教文化、习俗、法律变化的影响。随着维多利亚时期社会文化的发展,越到后来,夫妇地位关系越趋向平等是可以肯定的。

参考文献:

- [1] Judith Flanders. Inside the Victorian Home: a Portrait of Domestic Life in Victorian England [M]. New York, N.Y.: W.W. Norton, 2004:14.
- [2] Norman MacKenzi and Jeanne MacKenzie ed. Th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 1, 1873-1892, Glitter Around and

尔策编.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1.

[4] 杨晓明.知青后代记忆中的“上山下乡”——代际互动过程中的传递与建构[J].青年研究,2008(11).

[5]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72.

[6] 欧阳康.社会认识论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7] [英]古斯塔夫·亚霍达.图像的延续.论心目中他人形象的连续性[A].哈拉尔德·韦策编.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95.

[8] 郭景萍.社会记忆:一种社会再生产的情感力量[J].学习与实践,2006(10).

[9] 苏君华,周林.《集结号》、社会记忆与我们的责任——公共档案馆保存平民档案的意义与策略[J].山西档案,2008(4).

[10] [美]保罗·康纳顿.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6.

Darkness Within [Z].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108.

[3] Jane Lewis. Labour and Love: Women's Experience of Home and Family, 1850-1940 [M]. Oxford, UK; New York, NY, USA: B. Blackwell, 1987, 1986:32.

[4] [英]亨利·理查森.郭洪涛译.女人的声音[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96.

[5] Elizabeth Wolstenholme Elmy, writing in the Journal of the Vigilance Association, 1881 [J]. quoted from John Tosh. A Man's Place: Masculinity and the Middle-class Home in Victorian England,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161.